

真誠與說謊：延安文人心態的特殊變奏與有機化形成

◎ 袁盛勇

一 給「知識份子」正名

對於一個革命作家來說，在寫出真正的革命文學作品之前，最為關鍵的在其「可是一個『革命人』」，因為按照魯迅的說法，如果作者真是一個革命人，「則無論寫的是甚麼事件，用的是甚麼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學』。從噴泉裏出來的都是水，從血管裏出來的都是血。」¹其實，這是毛澤東在延安時期特別是整風運動開始後所致力要解決的歷史性課題之一，他多麼焦灼地希冀延安文人能夠盡快被塑造成為他所認可的真正意識形態化或有機化²的文人。

但是，要對知識份子和延安文人進行改造，要想把他們改造成為真正的有機化文人，首先就遇到了一個如何重新界定知識份子的問題。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毛澤東把知識份子分為三類，這就是共產主義知識份子、革命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和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對於延安文人和知識份子，毛澤東在階級屬性上是把他們視作小資產階級的。他說，「農民以外的小資產階級，包括廣大的知識份子、小商人、手工業者和自由職業者。」又說，「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並不是一個階級或階層。但是從他們的家庭出身看，從他們的生活條件看，從他們的政治立場看，現代中國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的多數是可以歸入小資產階級範疇的。」³這在《講話》中也是非常顯明的。但是，延安整風前後，毛澤東對延安文人和知識份子的看法在重心上發生了一定轉變：以往較多注意這類人的優點，故在「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名稱上總要加上「革命的」三字，以作較為積極的意識形態限定；現在卻過多關注並凸顯他們所具有的小資產階級劣根性，認為延安文人還是對小資產階級自身有著驚人的迷戀，靈魂深處還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王國。此種認識的轉變是與他的下述判斷聯結在一起的，他說：「中國是一個小資產階級成分極其廣大的國家，我們黨是處在這個廣大階級的包圍中，我們又有很大數量的黨員是出身於這個階級的，他們都不免或長或短地拖著一條小資產階級的尾巴進黨來。」所謂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都是反馬克思主義的，都不是無產階級所需要的」，而它們都是「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反映」⁴。正因如此，何謂「知識份子」的問題就會在新的歷史情境中異常醒目地進入毛澤東的理論建構和批判視野。

關於這點，當時有人撰文指出，毛澤東在〈整頓學風黨風文風〉的著名演講中實則對知識份子問題「重新作了一個估計」⁵和界定。凱豐亦就此指出：「我們平常所說的知識份子，是就他的社會出身而言，如果他的社會出身是知識份子，即使他一點真正的知識沒有，還是一個百分之百的知識份子。」毛澤東在整風報告中「所說的知識份子是指理論與實際相聯繫而言，凡理論與實際相聯繫的，就叫真知識份子，否則就不是名符其實的知識份子」⁶，或者說是假知識份子。這就是所謂的名不正則言不順，可見「正名分」在毛澤東意識形態話語的建構中顯得何等重要。關於「正名分」，毛澤東曾說：「『正名』的工作，不但孔子，我們也

在做，孔子是正封建秩序之名，我們是正革命秩序之名」，其區別僅在「孔子是名為主，我們則是實為主」而已⁷。那麼，毛澤東是如何為知識份子正名的呢？他在整頓三風的演說中首先就何謂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發表了看法。他認為，某人馬列主義書籍讀得再多也不能斷定他就是馬列主義理論家，「因為馬列主義是馬恩列斯他們根據實際創造出來的理論，從歷史實際與革命實際中抽出來的總結論。我們如果僅僅讀了它，但是沒有根據它來研究中國的歷史實際與革命實際，沒有創造出合乎中國實際需要的自己的特殊性的理論，我們就不能妄稱為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在這個意義上，即使「一個人讀了一萬本馬恩列斯，每本又都讀了一千遍，以至於句句都背得，這還是不能算理論家的。」那麼，毛澤東要的是甚麼樣的理論家呢？他要的是「能夠依據馬恩列斯的立場、觀點、方法，正確地解釋歷史中與革命中所發生的實際問題，能夠在中國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種種問題上給予科學的解釋，給予理論的說明」的理論家。他認為，只有這樣的理論家才是真正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否則就是假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考慮到當時中共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現狀，這真的理論家實際乃指毛澤東及其理論上堅定的追隨者們，假的理論家是指王明、張聞天、博古等有留蘇背景的黨內理論家們。這些理論家是「知識份子」，而且是黨內大知識份子，因此，毛澤東趁勢又解釋了何謂知識份子的問題。他在論述時採用的是先揚後抑的手法。首先肯定了中共大量吸收知識份子和尊重知識份子的必要性，指出「沒有革命知識份子，革命就不會勝利」，可接下來話鋒一轉，說：「但是我們曉得，有許多知識份子，他們自以為很有知識，大擺其知識架子，而不知道這種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礙他們前進的。他們應該知道一個真理，就是許多所謂知識份子，其實是比較最無知識的，工農份子的知識有時倒比他們多一點。」⁸毛澤東說知識份子最無知識，這句話後來經過康生在整風會議上的反復渲染，簡直成了延安最為流行的警語之一，對知識份子而言也就成了無可逃脫的一句咒語。所以當時的延安文人和知識份子最初聽了都感到吃驚而震撼⁹。但毛澤東正是沿著這樣一種話語邏輯，運用其特有的階級分析方法，改變了以往知識份子在啟蒙結構中的優勢地位，啟蒙者與被啟蒙者在新的意識形態話語中發生了根本性易位：「拿未曾改造的知識份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份子不乾淨了，最乾淨的還是工人農民，儘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都乾淨。」¹⁰於是，這自然有一個思想改造的問題，有一個身份轉換的問題，有一個原來的啟蒙者向被啟蒙者如何進行學習的問題。因為只有經歷這樣一個過程，延安文人和知識份子才能掃除靈魂上的污點，改變自己的世界觀，才能真正做到把立足點「移到工農兵這方面來，移到無產階級這方面來」¹¹。要讓延安文人真能達到此等思想境地，真正打破出身階級的束縛而成為無產階級的有機化文人，就必須進行長期的思想改造，並把它們及時納入到正在開展的整風運動中來。

二 整風學習與內聖之學的復活

1942年4月3日，中宣部發佈了整風期間第一個「四三決定」，要求延安開始進入整風學習階段，學習中央規定的二十二個文件¹²，並且詳細規定了學習步驟和方法：各機關、學校「要深入的研究，熱烈的討論，先把這些文件的精神與實質領會貫通，作為自己的武器。為此目的，各同志必須逐件精讀，逐件寫筆記，然後逐件或幾件合併開小組會討論，必要時由中央及本部派人作報告。在閱讀與討論中，每人都要深思熟慮，反省自己的工作及思想，反省自己的全部歷史。」¹³以後的整風文件學習在基本方法上都是按照這一規定執行的。首先，無疑是要求大家精讀文件，領會文件精神。這「精神」有人把它喻為「道法」，認為中央規定的整風文件，「不僅英光灼灼，而且血淚斑斑」，是黨在此前艱苦鬥爭中所獲得的寶貴經

驗，「創道法很難，學道法也很不易」，故而必須「熟讀深思」¹⁴。目的在於較好地促進人們深刻領會文件精神或實質，提高整風學習效果。但整風期間，精讀文件還只是最初的階段之一，要想真正讓人對新的意識形態及其領袖人物產生完全認同，還必須引導大家開展深入的自我反省。

謝覺哉當時寫了一篇文章，題為〈由討論到反省〉，《解放日報》把它作為「代論」（代社論）發表，正好表徵了這樣一個階段的必然到來¹⁵。其倡導「反省」的理論依據來源於《解放日報》此前刊發的一篇社論。這篇社論要求參加整風的革命同志「一定要反省自己」，因為反省自己正是人們「掌握文件精神和實質的必要條件」，只有經過這一階段，才能徹底揭示並清除自我靈魂深處「小資產階級的散漫性和自由主義的習氣」，「建立起無產階級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風」，也才能「真正了解文件，實行文件中所包含的道理」，更好地達到整風的目的¹⁶。此種反省是必須對照文件中的每一條來實行的，是要運用文件來反省自己。毛澤東在中央學習組召開的高幹會上曾經對此有過明確論說。他認為，「批評和自我批評是一個整體，缺一不可，但作為領導者，對自己的批評是主要的。幹工作要有一個重心，今天我們教育工作的重心，在自己考慮一下、研究一下，自己反省一下，重心在自己……要使我們所有的學生、幹部都了解，在整頓三風時重心在自己。」因而，他要求每一位「在座的同志要以身作則，自己進步，要反復研究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歷史、自己現在的工作，好好地反省一下」。反省的重要方式就是寫反省筆記。對這，不僅前述中宣部「四三決定」有規定，而且毛澤東在此次高幹會上作了進一步強調。他說¹⁷：

中宣部那個決定上說要寫筆記，黨員有服從黨的決定的義務，決定規定要寫筆記，就得寫筆記。你說我不寫筆記，那可不行，身為黨員，鐵的紀律就非執行不可。……不管文化人也好，「武化人」也好，男人也好，女人也好，新幹部也好，老幹部也好，學校也好，機關也好，都要寫筆記。首長首先要寫，班長、小組長都要寫，一定要寫，還要檢查筆記。……現在一些犯過錯誤的同志在寫筆記，這是很好的現象，犯了錯誤還要裝老太爺那就不行。過去有功勞的也要寫筆記，……也許有人說，我功勞甚大，寫甚麼筆記。那不行，功勞再大也得寫筆記。

毛澤東講話寫文章本以簡潔有力著稱，可這次說到領導幹部必須帶頭進行自我反省並寫反省筆記時卻囉嗦之至，唯恐與會者聽不明白。可見，「反省」在整風運動的開展中是何等重要的一個環節。

對於一個深通中國文化和中國士人心理之奧妙的領袖而言，毛澤東在此肯定想到了傳統的內聖之學。早在1939年8月，劉少奇在延安馬列學院講演〈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時就曾借儒家「吾日三省吾身」之說，強調黨員必須加強黨性修養，其中並有對「克己奉公」的鼓吹，這也容易在形式上被人想起儒家「克己復禮」之說和「公天下」的社會理想觀念。劉少奇在黨性修養理論中明確運用傳統的內省方法，並且多次借用傳統語彙來說明共產黨員修身之重要和修身之可行，其實正因應了毛澤東所謂馬列主義中國化這一具有民族主義色調的意識形態之構建路徑的需求，毛當年之所以非常欣賞劉的這次演講並把它列入整風文件之中，恐怕這也是原因之一吧。關於這層意思，凡是對古代歷史與文化較為熟稔的，當不難領悟到。吳玉章曾寫道：在整風學習中，「我恍然覺得我們現在整風的工作，就是中國古聖先賢所謂『克己復禮』『正心誠意』的修養」，「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中庸》），雖然舊思想是唯心的，但他的嚴於自己省察、行為不苟，是可寶貴的。」¹⁸古代儒家修身之法「慎獨」在整風期間亦得以提倡。在整風文獻中，這也始見於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劉氏認

為，作為一個黨員，只要他真正做到了大公無私，具有共產主義美德，那麼，他就「可能最誠懇、坦白與愉快。因為他無私心，……即使當他個人獨立工作無人監督可能作各種壞事之時，他能『慎獨』，不作一切壞事。」¹⁹於是，「慎獨」也就自然成為參與整風者進行自我反省或自我批評的方法和原則之一²⁰。延安整風在方法上所具有的傳統修身色調，在一篇題為〈反省〉的社論中表現得相當觸目。其中有兩段是這樣寫的²¹：

反省用不得「怨」字，尤其不可先有成見，在胸腔裏做擋箭牌。古時賢人曾子說過「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錯誤總是有的，沒有錯誤，到（倒——引者）是怪事；反省越深刻，改正越努力，發見錯誤的也越多，這就是一步步地上進。……

反省，等於古人說的「夜氣」，白天做的，晚上睡在枕上一想，良心發現，懺悔了；或者靈光一閃，懂得了。馬上把它捉住，「操則存，舍則亡」。這不是件易事，必有空明的腦子（無成見），充分的時間（不煩忙），相當的知識（文件看懂了），才能有好的反省。它不是為給人看而反省，而是為著真正自己的修養。

由此可知，儒家的東西在延安整風中已經奇跡般地復活了。陳伯達在他論述自我反省的文章中，認為馬列主義本來「並不是甚麼神秘的東西」，只要人們樂於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都有「得道」的可能，因為按照孟子的說法：「人皆可以為堯舜」²²。孟子這話的意思是，人人都可以成為像堯舜一樣具有高尚之德的聖人。但要真做到這點，按照儒家的說法，就要「克己」、「無我」、「無欲」、「無私」。於是，在這一人格化模式中，人也就成了完全道德化的人，人也就被「道德」吃掉了。其實，延安整風所要達到的目的之一也與此不無類似。所謂反對主觀主義、自由主義、個人主義，說到底就是為了根除個體人格之本心，而讓人把一種據說唯一正確和高尚的意識形態理論和道德觀念內化為自己的本心，這樣，人也就成了一個具有「非人格化」意味的社會性軀殼。因此，毛澤東提倡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就不僅僅只是借鑒了列寧主義塑造新人的方法，它與古代的內聖之學或內聖外王之道具有一種深刻的關聯，正是在這點上，它已經具有某些民族主義的風味，具有一種道德本體主義的氣質²³。或許正因如此，它才易於為那些帶有中國士人氣的知識份子所接受，延安整風也才會真正收到預期的效果吧。但問題是：採用類似傳統「修齊治平」模式來催促無產階級新人的誕生，果真能為「新人」帶來那種道德的完善並使全體國民日漸臻于聖人之境嗎？而具體對於延安文人和知識份子來說，他們在經受嚴厲的反省之後就真能達取一種至誠至信的精神境地？

三 真誠與說謊：延安文人心態的特殊變奏

本來，毛澤東希望人們通過整風對自我靈魂深處的小資產階級王國進行徹底清查和批判，並以此接續古老而又常新的內聖外王或修齊治平傳統，其目的主要在於重新構建人們的意識形態認同和道德自律機制，並在此之上重建個人的絕對權威形象。因此，他曾多次呼籲人們向黨交心，號召人們發揚實事求是的優良作風，對革命保持真誠的信仰，向黨和人民說真話。他說：「講真話，每個普通的人都應該如此，每個共產黨人更應該如此。」²⁴這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其實也正應和了延安文人對「真誠」的呼喚和歌頌，進而言之，因應了延安文人和知識份子所期待著的至誠人格建構心理。周立波曾經抒寫過他的「真誠」之歌²⁵：

我要強烈的反覆我的歌，
因為我相信我的歌是歌唱真誠的，
共產主義：真誠，
毛澤東：真誠，
那些在毒瓦斯和槍炮彈下衝鋒的人們，
那些在黃土荒山的山頂上揮著鋤頭的人們，
那些用一雙赤腳板走過雪山和草地的人們，
那些在饑俄的寒冷的牢監裏足足被關了十年的人們：
真誠。
凡是真誠的，都應被歌唱。
而我的歌還有這樣的使命：
叫真誠統治著人境。

我認為，此時延安文人所言「真誠」建立在自我觀察和體驗之上，因而帶有一定的個人性，符合文學與生命的自在本性。但至整風期間，「真誠」所賴以存在的個體性基座遭到了徹底批判，因而其內涵也必然發生了變化：這時的「真誠」強調的是對黨和革命的忠心，是要求人們把曾經擁有和現在具有的個人隱秘毫無保留地呈現出來，是要求人們徹底消滅自我存在的私人化空間，讓人在黨的審查面前成為一個透明的物體，成為一個時刻敞開而又空無的「此在」。於是，人們對「真誠」的呼喚也就轉化為黨對「忠誠」的要求，而這，其實正是毛澤東予以創構的新的意識形態的內在道德指向之一。那麼，在此種狀態下，人們是否真願或真能向黨完全交心或說真話呢？

1943年春，林默涵寫過一篇題為〈說真話〉的文章。他認為，「在檢查個人的思想時，最重要的事，便是要說真話。這有兩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對別人，一方面是對自己。」無論對人對己，都應當把自己真正了解的情況，「完完全全的說出來，是則是，非則非。好處要說，缺點也一樣的要說。」這才真正是「對黨負責」的態度²⁶。但是，說真話就真的那麼容易？首先，也許大家認為在批評別人時可能易於說真話。但是，延安整風期間在相互批評時就出現了不少互相攻訐、挾私報復的事。吃一塹、長一智，以後大都變得要麼保持沈默，要麼採取明哲保身的態度，要麼哼哼哈哈地說些雞毛蒜皮的小事²⁷。因而，在這本來就注重明爭暗鬥的中國社會，相互之間要真能以誠相待，把真話和盤托出，那才真是不可思議。其次，面對自己，要真能做到在眾人面前「脫褲子」、「割尾巴」，要真能做到把靈魂深處的秘密向黨坦示出來，那就更是難上加難了。當時有不少文人已經意識到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林默涵說，「要完全坦白的說出自己的一切，就比較難了。因為意識不正確的人，常有愛面子以及其他種種顧慮，覺得把自己的缺點或毛病向大家公開，總是一件丟臉的或者是可怕的事情。」²⁸林默涵把不敢說真話歸結為「意識不正確」，恐怕是理解得太簡單了。難道事情就真的如此簡單？

整風期間，為了便於黨的各級組織準確掌握每個人的歷史，更好地開展審幹運動，也為了挖出藏在群眾和幹部之間的特務或奸細，中央要求每位幹部抱著對革命忠實的態度撰寫較為詳細的自傳。但偏偏有位愛好文學的青年學生，也可說是青年知識份子，他在撰寫自傳時起初由於受到當時延安社會風氣的影響，在寫作時多處隱瞞真相，編造了一些虛假內容。換言之，他沒有按照黨的要求說真話，而是講了假話或說了謊。我們不妨較長地引述一段他自己的交代²⁹：

那是當我入校不久的時候，幹部處發下了很多的紙張和表格，叫我拿出對革命忠實的態度來，寫一個詳詳細細的自傳。我寫了，而且寫的很詳細，很長，還用上了我平常寫小說的手法了……我把我家裏的情景，都寫出來了，不過，就是有一點不夠真實。大家都知道，邊區是有共產黨的地方，共產黨就是無產階級的政黨。換句話說，就是窮人的政黨。我又是一個初到延安的人，我怕真實的寫出來，會與我家裏有害，與自己不利，最主要的，我也感到說出身貧窮的光榮。當時我想：少寫一點，總是好些。因為這，我家裏本有一百多畝地，我卻寫了二十多畝，我本是一個小地主的兒子，一變而為貧農的兒子了。我把我所知道的，我家裏的佃戶的窮生活，都寫成我家裏的生活了。王老五——我的一個窮鄰居，便作了我父親的模特兒了。我寫我家裏是這樣的窮：吃飯常吃飽，吃了上頓，沒有下頓；屋子露著天；我母親常常哭，怨老天爺不睜眼，她的命苦；我父親成天價唉聲歎氣的愁著沒法過，他一臉皺紋，鬍子都愁白了；我弟弟常哭著，嚷著餓，給我母親要饅吃，因為這我母親常打他……還有怎樣受地主的壓迫，等等一大套，我都寫上了，我很滿意，我自己寫的像真的一樣。

顯然，這位青年受到共產黨愈窮則愈革命這一觀念的影響，為了投其所好，也為了保護自己和家人，而有意改寫或編造了他的階級出身和家庭境況，並且寫得以假亂真，以至於後來幹部處的人都無從發現其中的虛假。倘若不是他本人膽小，害怕露餡，而去予以重寫修正，那麼這一自傳儘管是虛構而成，也不會被人輕易發現的。

這方面的經驗，對於那些經歷過多次群眾運動的人而言，應該說是很多的。比如，韋君宜有位同學曾在延安搶救運動中被錯打成特務，後來在平反大會上哭訴當時受冤屈的心理狀態時竟說：「我真後悔當時為甚麼要背叛我的家庭出來革命！我真應該跟著我的父親跑的。當時我就想過，如果能再見到我的父親，我就要對他說：把這些冤枉我的人都殺掉吧。」韋君宜聽了，只覺「心驚膽顫，如冷水澆頭」。因為這位女同學的父親當時是一個國民黨的專員，韋君宜「怕的是她這樣驚人的坦率，把心裏動過的這些念頭都公然在大會上說出來，這得了嗎？光為這句話，就可以把她又逮捕起來的啊！即使今天不捕，這筆賬記上，以後遇上『運動』隨時都可以要她的命！」³⁰韋君宜當時還只二十幾歲，就有這樣老成持重的念頭，就希望自己的同學和朋友對黨不要坦然說出自己的真實想法，而要學會在運動中偽裝自己，那麼，對於那些在革命熔爐中久經考驗的革命者來說，無疑更會對黨隱藏自己的真實想法了。因為大家清楚，倘若不能偽裝自己的真實念頭，倘若不能根據當時意識形態的需要而說點迎合時勢的話，那麼就有可能隨時導致生命的危險。或許在這個意義上，說謊已經成了那個時代和那種情境中的人們（自然包括延安文人和知識份子）面對外部及內心世界的壓力所具有的一種進行自我防禦的應對機制。當然，如果把說謊僅僅理解為出自生命本能的應對機制，那還並不完全符合延安政治文化語境所固有的實情。其實在一定程度上，它也是當時黨的審幹、搶救政策縱容和鼓勵的結果。比如在搶救運動中，一些子虛烏有的特務系統被捏造出來，凡是在搶救運動中表現積極，主動坦白自己是特務的，一概給以獎勵和表彰。表彰方法有戴大紅花的，有吃番茄掛麵、雞蛋掛麵或紅棗稀飯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故而一些人尤其是年齡較小的，為了享受一番難得的佳肴，也就拼命坦白自己就是國民黨派來延安搞破壞的特務³¹。有人被懷疑為特務，如果此人不承認或不配合組織的誘供，則將永世不得翻身，並且還要經受一番非人的折磨，而一旦承認了，則有可能再次受到組織的青睞，從輕發落。在此種情況下，被組織懷疑的知識份子也只好違心編造情節把自己說成是一大特務。楊述曾被組織內定為特務，但他起初死活不承認，害得「地委書記天天拍桌子大發雷霆」，在上級領導的一再督促下，韋君宜答應去勸說愛人楊述坦白。怎麼勸說的呢？韋君宜寫道：「我見了他，只說得一句：『形勢非叫你坦白不可，你就坦白了罷。』說罷就大哭起來。他

也放聲大哭，說了一句：『好的。』」³²之所以會「放聲大哭」，乃因他們無端受到了組織的懷疑和冷落，他們曾對黨抱著無比的熱誠，他們一直把延安當作心中的聖地來供奉，來讚美，認為到了延安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家，可現在他們被無端地拋棄了，他們甚麼都不是，由人見人愛的人變成了人見人唾的鬼。這叫他們怎能不倍感冤屈而淚流滿面呢？³³

其次，他們之所以會放聲大哭，乃因他們作為正直的知識份子，卻不得不昧著良心最終走上說謊的人生旅途，誠如韋君宜後來所言：「她參加革命就準備好了犧牲一切，但是沒想到要犧牲的還有自己的良心。」³⁴確實，對於受過現代教育並具有傳統美德的知識份子來說，有甚麼比不得不要去犧牲自己的良知更讓人痛心的呢？！但這種被迫的犧牲，當時卻往往被看作是具有黨性的表現，是忠於革命事業和對黨負責的表現。王世英是位元與劉少奇關係不錯的高級幹部，他初到延安後感覺「人際關係越來越難處」。有一次跟劉少奇說：回到延安，我好像學了一些壞東西，自己不願說的必得去說，不願做的必得去做，因而感覺沒有以前在白區幹秘密工作時那樣純潔。劉少奇卻說：你這不是學壞了，而是「學好了」，因為「所謂好壞之分，應從黨的工作，黨的利益出發，吹牛拍馬不好，但對工作有利就是好的，就要做。」³⁵所謂「吹牛拍馬」，其實就是陽奉陰違，就是講假話，就是不誠實，就是撒謊，而其被許可的標杆乃是所謂是否符合黨的利益。在這意義上，延安時期的知識份子開始昧著良心走上說假話的路途，開始養成自欺欺人的奴性品格，其原因恐怕除了個人因素之外，主要還是意識形態方面的緣故。質言之，在一定意義上，說謊正是延安整風期間日漸成型的新的政治文化或新的意識形態的內在品格之一，是為其所許可的常態性表達機制之一。延安文人正是在此種機制規約下對新的意識形態表示全面認同，接受並認同毛澤東極力標舉的「黨的文學」觀念，而黨的文學觀念本來就立足於階級論原則或黨性立場而使「真實」也發生了符合於黨的利益的變形，具有極強的意識形態內涵，於是，這一併促使他們日漸喪失了自我感覺、判斷和言說世界的的能力，他們都注定按照黨的需要參與製造並使自己也一並存在於瞞和騙的氛圍之中。正是在這點上，延安文人定會成為曾被魯迅所激烈批判的做戲的虛無黨，自欺欺人地把真心「做事」變成真心「做戲」。當時有人寫過一篇題為〈做事與做戲〉的雜文，它雖是諷刺國統區重慶的，但借用來指涉延安或延安文人的情狀也算非常合適。文章指出：「做自欺欺人的戲的名角，聽說同時也就是高喊『至誠』為『民族精神之原動力』的『大師』」³⁶。當然，這從當時的意識形態角度來看，說謊本就是一種對黨真誠的表現，是產生意識形態認同的必要條件之一。

散文家吳伯簫可算是延安文人日漸走向說謊的典型之一。延安搶救運動期間，他擔任邊區教育廳中等教育科科長，不幸被打成「國民黨CC特務」，受盡了委屈。1944年3月，這一消息傳到國統區，據說他已被整死了，西安方面就為他開了追悼會。延安聽到了這消息，不久後也就特別安排他在「延安文化界招待中外記者團座談會」上發言，以示「闢謠」。隨即又把發言稿整理刊發在《解放日報》上。他在發言中說，「我們邊區是自由光明的地方，共產黨是行仁施義的政黨」，現在「我卻很健康，很愉快」地生活著：「在生產運動中，我的成績不壞，種菜紡線，是一名光榮的紡毛突擊手。在這裏，我們有上萬上幾十萬的親愛的同志，同志們都有兄弟姊妹般的，並超出兄弟姊妹般的情誼。……就這樣活著，並且活得很好，很好」³⁷！顯然，吳伯簫已經在說謊機制的驅使下，有意掩蓋了事實真相，雖然國民黨也是在借他的受難做文章，但他也不能睜眼說瞎話，把自己所遭遇過的不白之冤和心靈苦楚一併抹消。當然，作為後來者，我們也不能要求他在那樣一個歷史情境中完全說出實情，在一個動輒得咎的政治語境中，真想說出實情那是需要相當大的勇氣，更是需要以生命作抵押的。因為，即如韋君宜來說，她雖然在當時寫了以上那首充滿不平之意的詩作，以後又堅持寫了那

本具有反思力度的《思痛錄》，但直到1990年代初期，她還不許親人把那首詩拿出去發表³⁸。我想，她是寧願把這段真情埋在心底，讓它化作塵埃隨風而逝的。再說王實味吧，這位曾被視為延安時期最為具有錚錚個性且有魯迅精神的知識份子，不也曾被有關部門安排跟中外記者見面，並且按照有關人士的授意而當眾違心地承認了自己的錯誤嗎³⁹？因此，延安文人所必然具有的說謊機制的產生，既是個人的原因，更是政治的、社會的和意識形態的原因⁴⁰。正是由於後者的無處不在，他們的某些說謊才是合法的，也才會確如「真誠」一樣光芒四射而成為中國知識份子和民眾的一種美德。也許，在那嚴酷的政治意識形態統制下，人們為了生存必須說謊，不會說謊才真是一個時代的愚者呀。而對延安文人來說，他們連自我感情的抒寫在整風期間都遭到了徹底批判和否定，誠實的心靈袒露也就自會受到超我的強烈抑制，因此，為了適應歷史情境的需要，他們不得不有意識地戴上了足可自欺欺人的人格面具。於是，說謊也就成了他們正常的存在狀態。而且，這一說謊心理和說謊機制的產生更會由於當時恐怖氣氛和恐懼心理的存在而得到進一步加強。

四 恐懼、說謊與意識形態認同

毛澤東曾在中央黨校做過題為〈整頓學風黨風文風〉的著名演講。他在強調感性知識和理性知識結合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強調於生產和鬥爭實踐中得來的感性知識更具有某種優越性之後，說了如下一段饒有風趣的話：

像大司父（大師傅——引者）煮飯就不容易，要把柴米油鹽醬醋等件合起來創造成吃的東西，這是並不容易的事情。弄得好吃更加不容易。……火大了要焦，鹽多了發苦（笑聲），煮飯做菜真正是一門藝術。書本上的知識呢？如果只是讀死書，那末，只要你識得三五千字，學會了翻字典，手中又有一本甚麼書，公家又給了你小米吃，你就可以搖頭擺腦的讀起來。書是不會走路的，也可以隨便把它打開或者關起，這是世界上最容易辦的事情。這比大司父煮飯容易得多，比他殺豬更容易。你要捉豬，豬會跑（笑聲），殺它，它會叫（笑聲），一本書擺在桌子上既不會跑，又不會叫（笑聲），隨你怎樣擺佈都可以。世界上那有這樣容易辦的事呀！

又在指斥純粹的理論知識份子時說了如下一段話⁴¹：

直到現在，似乎還有不少的人，把馬列主義看作現成的靈丹聖藥，只要得了它，就可以毫不費氣力的包醫百病。這是一種幼稚的蒙昧，我們對這些人還應該作啟蒙運動。那些將馬列主義當宗教教條看待的人，就是這種蒙昧無知的人。對於這種人，應該老實的對他說，你的教條沒有甚麼用處，說句不客氣的話，實在比屎還沒有用。我們看，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條呢？既不能肥田，又不能喂狗，有甚麼用處呢？（笑聲）

請大家仔細讀讀這兩段話吧。毛澤東論及知識份子，他先貶之以煮飯的師傅，再把苦苦鑽研理論的行為抑之以屠夫的殺豬，更把抽象的知識（所謂「教條」）說成「實在比屎還沒有用」。用語之尖刻恣肆，諷刺之不留情面，在現代中國語文史上，實不在魯迅之下，且其粗俗方面，魯迅自是望塵莫及。由此觀之，在毛澤東的意識形態話語中，知識份子受到了盡情嘲弄，而且是滿含了一股怨氣的嘲弄。或許是感到以上所舉例證和言語事後想來實在有礙觀瞻，所以毛澤東在後來主持出版「毛選」時就把它們通通刪掉了。但在當時，他的這套粗俗之極的話語卻是發揮了很大威懾力的。首先，他把偏重馬列經典的知識份子貶為狗屎不如的

東西，顯然是有意為之，誠如他所言：「我這樣說的目的，就是故意挖苦那些把馬列主義看成教條的人，使他們大吃一驚，甦醒過來，好拿正確的態度對待馬列主義。」⁴²他在〈反對黨八股〉中更是把它提到方法論的高度來說明：「說理的首先一個方法，就是重重地給患者一個刺激，向他們大喝一聲，說：『你有病呀！』使患者為之一驚，出一身汗，然後好好地叫他們治療。」⁴³顯然，毛澤東是在著意給人造成一種恐懼心理，讓人在恐懼中對新的意識形態有所皈依。而且，他所著意營造的恐懼氛圍在當時工農幹部和一般群眾的「笑聲」中得到了進一步加強。

其實，毛澤東在整風期間對恐懼氣氛的營造和恐懼心理的利用在其輝煌的革命生涯中具有延續性。早在1927年3月所寫的經典性革命文本〈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他就以非常讚賞的筆調寫到了農民為所欲為的狂歡性表演：「的確的，農民在鄉里頗有一點子『亂來』。農會權力無上，不許地主說話，把地主的威風掃光。這等於將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反對農會的土豪劣紳的家裏，一群人湧進去，殺豬出穀。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動不動捉人戴高帽子遊鄉，『劣紳！今天認得我們！』為所欲為，一切反常，竟在鄉村造成一種恐怖現象。」毛澤東認為，這種恐怖現象在農民運動的革命時期是非常之需要的，「質言之，每個農村都必須造成一個短時期的恐怖現象，非如此決不能鎮壓農村反革命派的活動，決不能打倒紳權。」⁴⁴顯然，整風期間毛澤東對恐懼氛圍的營造在其思想觀念中具有連續性，只不過早期為他所讚歎的「恐怖」是從政治革命角度來看待，發生在農村，針對的是鄉紳；延安時期他所倡導構築的「恐懼」是從思想革命角度來看待，產生自延安，針對的是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和一切意見不合的異己者。問題是，延安時期知識份子所遭遇的恐怖氛圍遠比我們想象的要複雜得多，它不僅僅是所謂思想上的，更是肉體上的。肉體上遭遇的折磨乃至生命的遽然消失其實遠比觀念轉換時的心靈痛苦要直接而具象得多，這也是人類歷史上的統治者為何要長期使用酷刑的原因之一。整風期間，延安文人在和風細雨的思想改造之外，也能時時感受到血雨腥風的恐怖場景存在，當整風發展到審幹和搶救階段時更是如此。在當時凌厲的政治攻勢面前，在嚴重的「逼供信」狀況下，誰會不會感到恐懼和震驚，誰會不會產生說謊或欺騙以求蒙混過關的心理呢？！正如後來有人在延安大學審幹搶救甄別小組會上所言，不少人當時承認自己是特務的原因乃主要在於：「不是對組織忠實坦白，而是受『逼供信』的罪，不得不欺騙組（織）一下，也不是出於本心」⁴⁵。

由於不堪精神和肉體的雙重折磨，許多知識份子被迫走向精神崩潰乃至絕望的境地。據胡喬木說，在延安審幹、搶救運動中，僅半個月就挖出了所謂特嫌分子一千四百多人，許多幹部惶惶不可終日。而這些幹部尤以知識份子為多⁴⁶。許多知識份子不堪凌辱，相繼走上自殺一途。據劉少奇1949年在天津的一次講話中交代，當時延安自殺身亡者即多達五六十人⁴⁷。再談幾個跟延安文人密切相關的例子。東北作家白朗流亡到延安，不料在審幹、搶救中，受到極大精神打擊，先是在解放日報社挨整，繼之在中央黨校三部遭批鬥，終於導致「在長達一年半的時間，白朗糊裏糊塗，癡呆麻木，整日不講一句話」。⁴⁸搶救期間，已經並入延安大學的「魯藝」的政治空氣也越來越緊張了。當時，魯藝共300餘人，卻有267人被打成特務，比例之高，駭人聽聞。有位叫高洛音的女青年，被迫承認自己是特務，是叛徒，並且抓捕過周揚，但事後由於過分恐懼而與其三個孩子一同自焚。也許是在精神崩潰之際，還在想著如何以免她的孩子不至於在日後遭到別人的侮辱吧。此外，木刻家彥涵親眼看到魯藝一位被審的青年，發瘋般沖出關押室，大呼「冤枉啊——」，縱身跳下懸崖，淒厲的聲音回蕩在山

溝，也久久縈蕩在彥涵的心裏。這樣的例子，實在還有不少。對於身處延安且在1943年都被相繼安排到中央黨校三部進行思想改造的幾乎所有較有名氣的知識份子和作家，他（她）們不能不生活在此種人人自危的處境之中，並且定會時時感受到恐怖的陰影正在向著自己悄悄襲來。薄一波曾經認為中央黨校是延安搶救運動的重災區之一，而且真切敘述過他所親眼目睹的「搶救」慘狀，其實，這也構成了延安文人置身其間的生存環境的一部分。他說⁵⁰：

有一件我難忘的往事，其情其景多年來不時的湧上心頭，……那時我母親也與我一起到了延安，我把她安置在深溝的一個窯洞居住。有一天，我去看她時，她說，「這裏不好住，每天晚上鬼哭狼嚎，不知道怎麼回事。」我於是向深溝裏走去，一查看至少有六、七個窯洞關著約上百人，有許多人神經失常。問他們為甚麼？有的大笑，有的哭泣，……最後看管人才無可奈何地告我：他們都是「搶救」的知識份子，是來延安學習而遭到「搶救」的！

延安文人和知識份子正是在這種極端恐怖的境遇中開始走向深刻的靈魂滌蕩路途，開始切切實實按照上級組織的安排進行整風學習，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並進而由自省走向自虐的。由於他們的意識形態認同機制根植於一定的恐懼心理之上，故而也自然包含了一種說謊機制的產生，這無疑為知識份子和延安文人的意識形態認同增添了某種難以言說的複雜面影。但在當時，這個複雜性卻被人們輕易地忽略了。

註釋

- 1 魯迅：〈革命文學〉，《魯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544頁。
- 2 葛蘭西（A.Gramsci）曾經認為，「每個新階級隨自身一道創造出來並在自身發展過程中進一步加以完善的『有機的』知識份子，大多數都是新的階級所彰顯的新型社會中部分基本活動的『專業人員』」（〔意〕葛蘭西：《獄中劄記》，曹雷雨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第2頁），都是有機地隸屬於其所在的階級。因此，我之所謂「有機化」其實在意識形態本性上正是指「意識形態化」，它既是一種狀態，又是一個過程。
- 3 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0-641頁。
- 4 毛澤東：〈反對黨八股〉，《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3頁。
- 5 王子野：〈真知識與偽知識——讀書雜記之一〉，《解放日報》1942年5月28日第4版。
- 6 凱豐：〈如何打破教條主義的學習〉，《解放日報》1942年6月11日第4版。
- 7 毛澤東：〈關於〈孔子的哲學思想〉一文給張聞天的信〉，《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0頁。
- 8 毛澤東：〈整頓學風黨風文風（二月一日在黨校開學典禮的演說）〉，《解放日報》1942年4月27日第1-2版。此文建國後編入《毛澤東選集》時，毛澤東作了一些修改，刪掉了一些富有現場感和口語化的地方。故本文在引用該篇時主要採用初刊本。
- 9 參閱魏東明：〈從學院到實際〉，《解放日報》1942年6月2日第4版。
- 10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51頁。
- 11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57頁。
- 12 初為十八個文件，即：1、毛澤東二月一日在黨校的報告；2、毛澤東二月八日在延安幹部會上的報告；3、康生兩次報告；4、中央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5、中央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6、中央關於延安幹部學校的決定；7、中央關於在職幹部教育的決定；8、毛澤東在邊區參議會的

演說；9、毛澤東關於改造學習的報告；10、毛澤東論反對自由主義；11、毛澤東農村調查序言二；12、聯共黨史結束語六條；13、史達林論黨的布爾什維克化十二條；14、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第二章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節；15、陳雲論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16、紅四軍九次代表大會論黨內不正確傾向；17、宣傳指南小冊；18、中央宣傳部關於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毛澤東同志整頓三風報告的決定。後增補了四個文件，即：19、史達林論領導與檢查，20、列寧、史達林等論黨的紀律與黨的民主，21、史達林論平均主義，22、季米特洛夫論幹部政策與幹部教育政策。

- 13 〈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毛澤東同志整頓三風報告的決定〉，《解放日報》1942年4月7日第1版。
- 14 煥南（謝覺哉）：〈應該「熟讀」而又「深思」〉，《解放日報》1942年4月25日第2版。
- 15 參閱謝覺哉：〈由討論到反省〉，《解放日報》1942年6月13日第1版。
- 16 社論：〈一定要反省自己〉，《解放日報》1942年5月23日第1版。
- 17 毛澤東：〈關於整頓三風〉，《毛澤東文集》第2卷，第416-418頁。
- 18 吳玉章：〈以思想革命來紀念抗戰五周年〉，《吳玉章文集》上卷，重慶出版社1987年版，第240頁。
- 19 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解放日報》1942年4月13-14日第4版。
- 20 參閱韓作黎：〈我是怎樣反省自己的〉，《解放日報》1942年6月20日第4版。
- 21 社論：〈反省〉，《解放日報》1942年8月16日第1版。
- 22 陳伯達：〈思想的反省——學習隨筆之二〉，《解放日報》1942年8月28日第4版。
- 23 參閱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來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427-436頁。
- 24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口頭政治報告〉，《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9頁。
- 25 周立波：〈一個早晨的歌者的希望〉，《解放日報》1941年10月28日第4版。
- 26 默涵：〈說真話〉，《解放日報》1943年4月7日第4版。
- 27 參閱師魯：〈關於批評方法問題的研究〉，《解放日報》1942年4月11日第2版。
- 28 默涵：〈說真話〉，《解放日報》1943年4月7日第4版。
- 29 甘雨禾：〈我底自傳是怎樣寫成的〉，《解放日報》1942年4月26日第4版。
- 30 韋君宜：《思痛錄》，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7頁。
- 31 延安大學搶救甄別階段即有人在座談會上談過當時的真實想法，雲：「痛恨自己在外邊沒有參加過特務活動，否則坦白了才光榮，還受優待，免得和組織對立。」（延安大學甄別小組：《審查工作彙報記錄整理·小組會議錄的整理》，西安：陝西省檔案館存件，全宗號16，案卷號49。）
- 32 韋君宜：《思痛錄》，第12、14頁。
- 33 韋君宜當時寫了一首較長的詩，真切地記述了當時遭受冷落倍受冤屈的心路歷程，其中寫道：「八年來／對人說／這兒是我們的家／可是／如今在家裏／我們卻成了外人／那好比一個暖熱飛騰的夢／（可憐那個糊塗夢）」。夢破了，這給人的打擊該多麼巨大，而對生性敏感的知識份子來說更是如此，所以韋君宜難抑心中的憤懣，仿佛向天呼告道：「家啊！／你對我們／就是這般模樣！／究竟誰是手足！／誰是仇人？／誰是親人／誰是奸臣？／光明的世界裏／卻攪在一團糊打混／我們如今成了外人／有辱罵／有冷眼／有繩索／有監獄……／……看那些冷眼／世上人有什麼肝膽？」於是，韋君宜一類知識份子曾經懷有的那片對黨的純真在剎那間被徹底摧毀了，她（他）們仿佛成了流落街頭的無名歌手，只好哭一般地傾訴自己抑鬱的心曲，在茫然中等待諾亞之舟的到來：「家呀／（讓我再呼喚這一聲！）／我們對得住你／你愧對了我們

／世界／人生／革命／學來好大個聰明！／如今／已變成無家的流民／夜晚尋不上宿頭／讓我彈一曲沒弦的琴／你聽／站在曠野裏／呆望著／最遠的星星……」（轉引自楊團：〈回應韋君宜·代序〉，載邢小群、孫璿編：《回應韋君宜》，大眾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第12-13頁。）

- 34 轉引自楊團：〈回應韋君宜·代序〉，載邢小群、孫璿編：《回應韋君宜》，第14頁。
- 35 參閱段建國、賈岷岫：《王世英傳奇》，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44-245頁。
- 36 李心清：〈做事與做戲〉，《解放日報》1942年4月7日第4版。
- 37 吳伯簫：〈斥無恥的「追悼」〉，《解放日報》1944年7月3日第4版。
- 38 參閱楊團：〈回應韋君宜·代序〉，載邢小群、孫璿編：《回應韋君宜》，第11頁。
- 39 趙超構曾對此寫道：「當我們坐下來的時候，王實味卻先開口談起他自己的事情來了。談話的神情完全像演講，時刻舞著手勢以加強他的語氣，說到他過去的『錯誤』，他的表情嚴肅到可怕。有時，竟是聲色俱厲的。」（趙超構：《延安一月》，上海書店1992年版，第147頁。）
- 40 應該指出，說謊在政治極權狀態下具有普遍性，也是政治性的需要所致，並非無產階級所獨有。比如美國政壇和人民的謊言也多。但在一種有著健全政治體制的情境下，被迫的說謊往往能夠得到有效抑制和及時揭露。所以，關於政治意識形態統制下說謊心理的產生，應該說是非常複雜的，除了把它歸結為個人的、社會的以及政治意識形態本身的原因之外，政治體制的建構以及如何建構也是一個重要因素。
- 41 毛澤東：〈整頓學風黨風文風（二月一日在黨校開學典禮的演說）〉，《解放日報》1942年4月27日第1-2版。
- 42 毛澤東：〈整頓學風黨風文風（二月一日在黨校開學典禮的演說）〉，《解放日報》1942年4月27日第1-2版。
- 43 毛澤東：〈反對黨八股〉，《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33頁。
- 44 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7頁。
- 45 延安大學甄別小組：《審查工作彙報記錄整理·小組會議錄的整理》（1944年9月），西安：陝西省檔案館存件，全宗號16，案卷號49。
- 46 參閱胡喬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8-279頁。
- 47 參閱朱鴻召：《延安文人》，廣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6頁。
- 48 王良：〈羅烽、白朗蒙冤散記〉，《新文學史料》1995年第2期。
- 49 參閱孫志遠：《感謝苦難：彥涵傳》，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42頁。
- 50 薄一波：《七十年奮鬥與思考》上卷，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362頁。

袁盛勇 1970年生，男，湖南新化人。復旦大學文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在職博士後。現為浙江師範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現代中國文學與思想史研究。已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魯迅研究月刊》等期刊上發表論文三十餘篇，撰有博士論文《宿命的召喚——論延安文學意識形態化的形成》。另主編並出版有《聚焦二十世紀》（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8月版）等著作三種。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三十二期（2004年11月30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